



聂月岩 著

# 邓小平 与爱国人士

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98 2252 0



# 邓小平与爱国人士

聂月岩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与爱国人士 / 聂月岩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6

ISBN 7-5073-1899-0

I. 邓… II. 聂… III. 邓小平 (1904~1997) 一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2533 号

## 邓小平与爱国人士

---

著 者 / 聂月岩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装帧设计 / 刘 这

版式设计 / 李 也

---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销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通县运河印刷厂

---

880 × 1230mm 大 32 开 12.625 印张 28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

ISBN 7-5073-1899-0 定价: 29.80 元

---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邓小平与陈济棠 / ■■■

成渝铁路一定要搞

——邓小平与陈修和 / ■■■

“焕章先生是和我们有缘的”

——邓小平与冯玉祥 / ■■■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邓小平与高树勋 / ■■■

“李明瑞是坚决的!”

——邓小平与李明瑞 / ■■■

“听说你阿沛就不主张打仗,主张和平谈判”

——邓小平与阿沛·阿旺晋美 / ■■■

**“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个爱国者”**

——邓小平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 111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与原工商界五位元老 / 113

**“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

——邓小平与荣毅仁 / 131

**“白天鹅好”**

——邓小平与霍英东 / 142

**“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很久了”**

——邓小平与金庸 / 161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邓小平与李嘉诚 / 162

**“咱们早该见面了”**

——邓小平与包玉刚 / 163

**“这个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

——邓小平与20位华人科学技术专家 / 164

**“您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呀”**

——邓小平与爱泼斯坦 / 165

**"我用桥牌来训练脑筋"**

——邓小平与杨小燕 / ■■■

**"你们在美国举办 '中国统一之展望' 讨论会,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邓小平与杨力宇 / ■■■

**"这几年你做了不少事情"**

——邓小平与丁肇中 / ■■■

**"感谢邓主任的关心"**

——邓小平与李政道 / ■■■

**"你们为中国做了许多事情, 应该感谢你们"**

——邓小平与吴健雄 / ■■■

**"江南猫王"**

——邓小平与陈莲涛 / ■■■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

——邓小平与费孝通 / ■■■

**"邓小平同志真是我们的知己啊!"**

——邓小平与黄汲清 / ■■■

**“为什么不叫黄昆搞本行？”**

——邓小平与黄昆 / ■■■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教育入手”**

——邓小平与苏步青 / ■■■

**“您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邓小平与汪云松 / ■■■

**主要参考书目 / ■■■**

# 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 ——邓小平与陈济棠

1980年9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籍华人陈树柏教授和夫人。陈树柏的父亲就是国统时期大名鼎鼎的“南天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的陈济棠。

“我是称呼你教授呢？还是陈博士？”邓小平一开口就满含亲切。

“请叫我的名字陈树柏好了。”

但邓小平坚持说，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于是，陈树柏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

邓小平笑道：“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接着邓小平说了一段令陈树柏颇感意外的话：“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陈树柏听了极为感动，他知道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人如此公开的称赞过他的父亲，惟有对“广东军阀陈济棠”

的大肆抨击。他谦逊的表示，那时候自己还小，不知道什么。

邓小平对陈济棠的称赞是言之有据的。1929年至1936年，陈济棠主持粤政，此间8年是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

## 初 掌 粤 政

在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陈济棠不但曾经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军阀。他出身贫寒，但不愿局限于山乡一隅。他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学，不久就投笔从戎，开始了改变他一生的军旅生涯。

陈济棠是在1929年3月上台开始执政广东的，结束了长期以来广东被外来军阀或政客霸占统治的历史，开始了“粤人治粤”的新局面。5月份，第一次粤桂战争刚刚落幕，陈济棠就宣布广东历经多年的战乱破坏，应赶紧从事建设，恢复地方元气。他决心今后积极帮忙建设，使徒事分利的军队，能直接为人民谋利益，表达了顺应地方呼声、重视地方建设的愿望。

陈济棠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比较独到的认识，也是他推行地方建设的重要原因。首先，他认为地方建设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手段。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不断深入的帝国主义主宰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他说“帝国主义每年运进15万万元的洋货来，把我们国内的生产事业都排挤得衰弱不堪。”帝国主义严重的经济侵略，使中华民族的生存成为问题，如果中国“产业落后工商凋敝，一任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已足灭亡而有余”。陈济棠认为，必须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针锋相对，而发展民族经济就是抵抗经济侵略、为民族求生存的惟一出路。他指出：“欲求民

族生存，非从经济上找出路不可。”其次，地方建设也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基础。陈济棠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危机中，必须创造更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抗日救国；而只有加强地方建设，才能“使得我们抵御外海的力量，从今日起日益增加”。1928年和1931年，日本分别制造了侵略中国的“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广东掀起了一次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日货在广东的地位受到削弱。陈济棠正是在抵制日货的怒潮中，萌发了“积极地振兴实业，使生产日增”的念头。再次，建设广东也是为了加快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其不负于“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历史。陈济棠认为，作为革命策源地，广东在几十年来为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在革命之后，在经济建设方面却有日趋衰败、落后之势。陈济棠“有见于此，心所忧之”，对本省建设的落伍感到难以忍受。他在“喘息稍定之时”，以一种肩负乡土建设重任的自信，断定此时的广东是从事建设的大好时机。他强调：“夫今日为乱极思治之时期，亦为积极建设之时期。”

### “三年计划”

为了对地方建设有一个系统的规划，陈济棠于1932年9月7日向西南政务委员会第37次政务会议提出实施“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建议。次年1月1日，该计划正式实施，这是陈济棠推进广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为了搞好这个计划，陈济棠集思广益。他特地函邀昔日的政敌徐景堂来广州，向他征求意见。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中译者之一，对经济建设素有认识，陈济棠也

几次与他“熟商今后本省政治建设之具体计划，及今后开始总动员之积极工作”。与此同时，陈济棠又广泛参考了历年来的地方建设的蓝图，择善而从之。在编制“三年计划”的过程中，他费尽了心血。当他写完这个计划后，竟然大病一场，梁漱溟亦叹为“用尽心力”。

陈济棠拟定的“三年计划”建议书有40万字，是包括城市和乡村、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救济、交通建设等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纲，名为“施政”，其实大部分是属于经济建设的。“三年计划”的主要内容，分“整理之部”与“建设之部”两部分。“整理之部”又分“吏治”和“财政”两部分。“吏治”部分以整顿、选拔、训练公务人员为核心，并提出实现县、市长直选的目标。“财政”部分主要是改善财政状况、稳定纸币、取消苛捐杂税、筹抵取消烟税赌捐、改征地税等。“建设之部”是三年计划的重头戏，分“乡村建设”、“城市建设”、“交通建设”三部分。乡村和城市建设两部分又再分为政治、经济、教育、救济四类。政治类，“乡村建设”主要是实行地方自治、训练地方警卫队、调查人口、土地等。经济类，“乡村建设”主要是改善佃耕制度、实行二五减租、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改良农林牧副渔各业、增加粮食生产等，“城市建设”则是设立平民学校、实习学校、发展职业教育、改良风俗、奖励科研和发明等。救济类，“乡村建设”主要有设立乡村医所、养老院、残废贫民教养院等，“城市建设”则是设立平民医院、设立养老院、托婴所、贫民教养院等。“交通建设”主要是发展公路、航运、通讯、铁路、民航等事业。

陈济棠搞“三年计划”虽附有复杂的政治意图，但对地方建设和发展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从实施效果来看，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不过，正如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中国政治所缺乏者，非堂皇冠冕之计划，而为计划之实行。”“三年计划”实施一年后，德国驻广州总领事瓦格纳认为：“改革的基架在过去已经完成，但由于政府不稳定的财政基础，使三年计划的推行十分困难。”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也认为该计划风险太大，建议德国政府劝阻德国公司在广东参与该计划，并且不要在德国公开宣传广东的“三年计划”。在他的要求下，德国外交部通知外贸当局，不向外界公布这项计划。到1935年终，“三年计划”第一期届满时，还有不少项目停留在纸上，许多宏伟蓝图没有化为现实。而番禺县竟乘机以“三年计划”之名敛钱，向老百姓收取“三年计划施政费”。老百姓在“三年计划”中直接受惠也不多，有人把他挖苦为“三年死症计划”。

陈济棠的“三年计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地方建设强调获取实利，力争搞好开局，因而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比如蔗糖工业原本不在“三年计划”之内，为了搞好建设的开局，陈济棠对“三年计划”加以变通，把蔗糖工业摆在地方建设的突出位置。而在推行大规模的地方建设之前，陈济棠还作了大量的兴利除弊工作，以创造良好的建设条件。

## 经济建树

在陈济棠的重视和工业、农业、外贸的发展促进下，广东的商业日渐繁荣。各界人士竞相投资商业，使商业的密度加大，商号资本增厚。各地商人、华侨和官僚办起了一大批的戏院、酒家、茶楼、旅社。广州著名的中山戏院、新华戏院、金门酒店、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修

建起来的。广州“影院之华糜阔大，惟上海有之，平津之平安大光明真光诸院，殊不足与之比”。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按当时的人口计，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商号总资本额达40461455元。在永汉路（今北京路），惠爱路，上、下九路，一德路等繁华的商业中心区，商户人数已占到这一区域人口总数的30%。1934年上半年，广州新开张的商店达3646间，比上一年同期增加930间。广州的商业如此发达，以致陈济棠把广州形容为一个“大商场”。

广州的城市面貌原本很旧，陈济棠以“广州五方杂处，中外观瞻所系，关于全市市容亟宜整饬”，下令广州市政府研究具体的整改方案，美化市容。经过整治和加快建设，广州城市面貌有所改观。由于地方建设的全面推进，广州在工业、金融、商业、通讯、交通、市政、科学教育等七大功能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陈济棠统治时期，洲头咀内港、海珠铁桥、海珠新堤、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仲元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及市内三级马路、渠道等先后建成，其中横跨珠江的海珠桥的建成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在全面规划交通道路的基础上，广州在市区大修马路。到1934年1月，全市马路总长度约141公里，其中约有占总长度63%的50多条马路是在1930年至1934年修建的。广州的东山在19世纪末离市区还有2公里远，是一个荒凉的小山丘。进入20世纪30年代，不少华侨陆续在东山购地建房，并投资开设了一家商店、工厂，使之逐渐繁荣，发展为广州的闹市区。由于城市建设加快，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广州，市区人口迅速增加。1929年，全市人口为811751人，1932年增长到1122583人，3年间增长了38.3%。梁漱溟也称赞说：

“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广州当之无愧的成为华南“首善之区”。

汕头是粤东工商和金融中枢，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较快。汕头市内的主要街道外马路、中山路、民族路、海关路、镇平路、安平路、商平路、西堤路及海平路等地的店铺和楼房，都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建筑的。市区人口在 1934 年达到 208608 人，市区面积达 36.7 平方公里，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汕头的抽纱业，“1933 年单就输出美国的货品数字即达国币 1200 万元”，加上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计达到 2700 万元。

此外，在外贸、金融、军垦事业、国内经济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当时广东市场兴旺，物价低廉，城乡人民生活稳定，有些年份还颇为宽裕。据国立中山大学当时的统计，广州六项货品（米、其他食品、衣料、燃料、金属及建材、杂项等）的批发物价指数，以 1926 年为基数 100，自 1931 年至 1936 年 1 月，每年分别为 111.4、109.7、104.1、94.6、89.1、95.1，每年变动幅度不超过 10%。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用港币一元在广州便可买到花布 20 码；一个港币可以买一份早餐，内含一碟芽菜炒粉、一碗粥加一根油条。1935 年，亦为外地人在离广东三水县约二三十里的西南镇，发现这里“竟有这样精美的茶馆，而且这里饮茶的人大半都是劳动阶级，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人民生计的宽裕”。一位当年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他的读书生活，把它与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的

学生生活相比，夸张地说二者已相差无几。不过，人民生活虽然大体上稳定，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东山一带甲第连云，而是内外贫民窟则污秽狭隘，直不足以避风雨；马路上华美汽车，绝尘飞驰，而长堤慈善收容所门前，囚首垢面的乞丐苦力，却又肩踵相接，欲求一饱而不可得。”

## 发 展 教 育

说起陈济棠治粤时期的重大建树，除了重视经济建设外，他还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陈济棠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热心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实属罕见。教育事业在他心目中“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在与胡政之的那次会晤中，两人一番长谈之后，胡政之有意告辞，“起立告辞者再”，而陈济棠执意挽留，使客人“卒得备聆其关于教育之意见而后退，时已十时矣”。1936年初，陈济棠与林云陔联名邀请一些中山大学的教授及教育界知名人士到省政府“洋花厅”宴叙。这些教授名人还以为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可陈济棠并没有谈及军国要政，“只是泛泛谈些维持教育学风的事，具见他们对青年教育关切之至意”。

在统治广东时期，陈济棠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为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他治粤业绩中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之一。概括起来，他发展教育的举措主要有：

增加教育投入。1932年5月，陈济棠致电防城县当局，“飭在全邑钱粮及官租各户口，按照应征粮额附加一倍，由21年起带征，作为辅助各区小学经费”。次年，陈济棠出巡东区，一路核减或取消了当地的许多捐税，大多移为当地的教

育经费。1935年，省政府规定各县经费的支出分配比例为：“建设费30%；教育费30%；公安费20%；其他占20%。”在陈济棠治粤的几年，教育经费增长较快。

发展中、小学教育。广东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小学教育。从陈济棠治粤之初至末期，全省普通小学由18964间增加到22754间，增长19.9%；在学学生由1098965人增长至1469406人，增加33.7%；还新办了二年制短期小学1130间，在校学生有90000人。从1934年起，省教育厅选定感恩等20个县，由省政府补贴，在每个县设立初级小学两间。次年又将补助的范围扩大到40个县，每个县开办短期小学4间。计划十年内使全省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中等教育方面，中学由205间增长至299间，增长45.8%；学生由45000人增长到61423人，增长36.5%。陈济棠还联同李宗仁设立优生奖学金（即奖学金），奖励两广的优秀学生。

发展高等教育。广东在原有的十几所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新办了勤勤大学、广州音乐学院、中医专科学校（1935年改称国医学院）、体育专科学校等一批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由4000人发展到5000人，增长了25%。陈济棠还明确要求大学要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他指出，“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科”，以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山大学校舍建设和勤勤大学的创办上，陈济棠的个人作用尤为突出。1932年春，邹鲁重掌中山大学，在陈济棠的支持下，积极致力于新校舍建设。这年3月，邹鲁制定了中大新校建设六年计划，分三期逐步实施，每期预定两年。1934年秋，当中大新校舍进入第二期建设时，由于资金不足，严重影响了新校舍第二期的如期完成。次年，

在中山大学 24 年度第一次董事会议上，身为中大董事的陈济棠首先提出“仿照赈灾办法，由全省党政军各机关捐款为新校建筑费，由中大拨农学院开投未出投之地以为奖励”。西南执行部第 184 次常委会及西南政务委员会第 185 次政务会议迅速接纳了陈济棠的提议。这一立竿见影的办法使中山大学迅速筹集到了一笔款项，如期完成了新校舍建设。建成后的中山大学新校舍位于广州石碑，校园巍峨堂皇，被誉为东亚最完善的高等学府。梁漱溟在参观新校后说：“如新建之中山大学校舍，据说为世界之第一大学校，确实极大，余曾坐汽车参观其校舍，在校路上不停地驰一小时余，尚未看完，其大可知。”勸勤大学是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而创立的。古应芬生前曾多次提携、扶掖过陈济棠，堪称陈济棠的大恩人。1931 年 10 月 28 日古应芬逝世后，陈济棠在广州国民党“四大会”上提议创办一所新的大学作为纪念，并以古应芬的字“勸勤”命名，广东省从省库中拨出 200 多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发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以其与地方建设的紧密联系而受到陈济棠的高度重视，陈济棠在“三年计划”中提出了两条教育施政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教育职业化”。广东新办了许多职业学校：如汕头的水产、商业学校，高州、梅县的农业学校，广州的工业学校、仲恺农工学校，潮州的陶瓷学校等。一些普通学校也纷纷改为职业学校，如世德学校、省立第五师范学校、顺德县立初级中学等。这些职业学校大多依托和服务于当地的特色经济。

发展师范教育和留学教育。为了培养大批合格的小学教师，陈济棠在全省实行师范学区计划，把全省划分为 10 个师范学区，每区至少设立省立男、女师范学校各一所。又在全